

# 大国竞争、联盟体系困境 与美国亚欧联盟联结

魏 冰

**摘 要** 当前，在同时将中国和俄罗斯认定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美国积极推动其亚洲联盟和欧洲联盟进行联结。但美国亚欧联盟联结也将强化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威胁认知、为两国提升安全合作注入动力，这反而会增强美国的战略压力。正是在这一战略大背景下，美国执意推动亚欧联盟联结问题便值得深入探讨。事实上，由大国竞争导致的联盟体系困境，即联盟体系在实现整体强化与维持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困境，是导致美国积极推动亚欧联盟联结的主要动因。在同时与中俄两个大国对手开展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均面临“被抛弃”与“被牵连”的双重风险。美国既需要借助盟友的力量和资源进行竞争，又不希望因盟友的挑衅而卷入冲突，而美国盟友则既需要争取美国的安全保障，又不希望卷入与大国的直接冲突中。此时，传统的联盟强化策略难以维系联盟可靠性。相反，联盟联结则能够通过提升竞争优势、降低安全成本和强化联盟约束三条路径，在实现联盟强化和维持联盟可靠性的同时，以低成本的方式满足美国的战略需求。然而，亚欧联盟联结也将促进美国主要盟友间的合作、提升其在联盟中的议价能力，最终可能削弱美国在联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 联盟困境 联盟联结 美国联盟战略 北约亚太化 亚太版北约

\* 魏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 100089）。

自2011年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就加强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战略竞争对手,提出竞赢(out-competing)中国和制约(constraining)俄罗斯是其全球战略的首要优先事项。<sup>①</sup>围绕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相继提升了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主要亚洲盟友的安全合作水平,并加强了北约的集体防御能力建设。在分别强化亚欧联盟的同时,美国也在设计将两个地区的联盟进行联结,推进“北约亚太化”与打造“亚太版北约”进程不断加速。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主要亚洲盟友和伙伴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如北约在2022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参加北约峰会,韩国和日本则分别于2022年5月和10月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CCDCOE)。另一方面,美国也在拉拢主要欧洲盟友介入亚洲事务,如美国在2021年9月联合英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建立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美国还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为平台,邀请英、法、德等国家共同参与军事演习和联合巡航。

在美国的强势施压下,中俄两国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为双方加强安全合作提供了动力。根据传统的联盟形成理论,国家在面临共同威胁时更可能建立联盟。<sup>②</sup>而一旦中国和俄罗斯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美国显然将面临极大的战略压力。对此,约翰·米尔斯海默就明确提出,美国应该不遗余力地使俄罗斯疏远中国。<sup>③</sup>美国103位对外政策专家也在2020年公开呼吁美国政府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sup>④</sup>然而,美国不仅没有选择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sup>⑤</sup>反而在亚洲联盟和欧洲联盟之间进行联结,此举无疑将进一步强化中俄两国对美国的共同威胁认知,为双方发展更为深入的安全合作关系注入新的动力。在同时将两个大国认定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为什么美国没有选择“分

---

①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pp.23-2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Chapter 6;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2.

③ John J. Mearsheimer,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7-50.

④ Rose Gottemoeller et al., "It's Time to Rethink Our Russia Policy," *Politico*, August 5,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08/05/open-letter-russia-policy-391434>.

⑤ 有学者考察了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没有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原因,参见曹玮、张瀚暘:《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26—60页。

而治之”策略，反而采取了一种可能鼓励对手加强合作的应对方式？

事实上，由大国竞争导致的联盟体系困境，即整个联盟体系在实现整体强化与维持可靠性（reliability）<sup>①</sup>之间的平衡困境，是美国推动亚欧联盟联结的主要原因。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使美国及其盟友同时面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进而导致美国面临联盟义务繁重、联盟管理难度大等难题，也使美国盟友面临安全保障不确定、冲突风险较高等问题。此时，传统的联盟强化策略已无法维持联盟体系的可靠性。而联盟联结是破解联盟体系困境的有效方式，美国作为联盟主导国希望通过提升竞争优势、降低安全成本和强化联盟约束三条路径，同时实现联盟强化和维持联盟可靠性的战略目标，帮助美国以低成本的方式满足其战略需求。

## 一、传统联盟困境的形式与应对

联盟成员国普遍面临“被抛弃”（abandonment）和“被牵连”（entrapment）的传统联盟困境。<sup>②</sup>现有研究在讨论传统联盟困境时主要关注两个议题，一是联盟困境在不同体系结构下的形式差异，二是成员国缓解联盟困境的手段。

### （一）体系结构与联盟困境形式

联盟政治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普遍将体系结构视为塑造联盟困境形式的主要因素。<sup>③</sup>他们认为，联盟困境在多极体系中最为严重。格伦·斯奈德就指出，“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在多极体系中会呈反向趋势变化，为削弱一种风险而采取的行动会提升另一种风险的可能。肯尼思·沃尔兹也支持这一观点，并强调多极体系下联盟的灵活性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实力相近，

<sup>①</sup> 本文采取伊恩·亨利对联盟可靠性的界定方式，将其视为盟友之间对特定利益的相对价值以及追求这些利益的方式达成一致的度。根据亨利的理解，联盟可靠性的最明显标志是联盟成员是否面临“被抛弃”或“被牵连”的风险。参见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4, 2020, pp. 45-83.

<sup>②</sup>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4, 1984, pp. 466-468.

<sup>③</sup> 格伦·斯奈德和沃尔兹对多极体系和两极体系中联盟困境的讨论，可参见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61-495;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 8.

会导致成员国更担心“被牵连”的风险。柯庆生和杰克·斯奈德将多极体系下的联盟困境概括为“锁链困境”(chain ga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两者与传统联盟困境的两种形式在内涵上是相似的,他们进一步指出,进攻优势认知更可能导致“锁链困境”,而防御优势认知则更可能导致“推卸责任”。<sup>①</sup>

相比多极体系,两极体系中的联盟困境则有所缓和。格伦·斯奈德认为,“被抛弃”的风险在两极体系中会大大下降,但“被牵连”的风险依旧存在,并且小国相比大国更担心“被牵连”,因为小国只有部分利益与大国重合。沃尔兹则强调,大国在两极体系中不需要关注联盟困境,因为大国与小国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使得联盟对它们无足轻重,大国的战略和政策更多依据自身的计算和利益而非联盟关系来制定。

而单极体系下的联盟困境则主要集中在小国身上。斯蒂芬·沃尔特探讨了单极体系中霸权国家主导的联盟,指出霸权国家对其小国盟友不存在战略需求,但后者仍然需要霸权国提供安全保障,因此它们对“被抛弃”的担忧会随之大大提升。霸权国家在单极体系下享有高度的行动自由,对“被牵连”的担忧会明显下降,不仅如此,由霸权国家主动挑起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小国“被牵连”。<sup>②</sup>

上述研究在两个方面存在不足。第一,忽视了联盟的扩展性功能。作为一种广义上的国际制度,联盟同样能发挥安全之外的功能。特别是在两极和单极体系中,大国需要借助联盟的力量塑造和维持秩序。<sup>③</sup>由于两极和单极体系中的竞争会在安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有所体现,因此大国的战略需求更加多元,联盟的功能也会随之进行扩展。这就意味着,小国盟友对大国而言具有安全之外的重要价值,不会被轻易抛弃。第二,没有考虑联盟成员面对多个竞争对手的情况。现有研究在讨论联盟困境时往往默认联盟成员只存在一个对手,此时直面对手的成员会担心被盟友抛弃、其他成员则担心被盟友牵连。但在国际政治现实中,国家有时候不得不同时面对多个对手,

---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1990, pp. 137-168.

②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98-99.

③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外交评论》,2021年第6期,第25—30页。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联盟困境的形式会变得更为复杂，成员国可能不得不同时面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双重风险。

## （二）缓解联盟困境的手段

为了缓解联盟困境，联盟成员会通过某些手段来调节彼此间的关系，以确保各自合理履行联盟义务。现有研究在如何缓解联盟困境的问题上已经形成了系统论述，它们主要将不对称联盟作为研究对象，并更多关注小国应对“被抛弃”的方式和大国应对“被牵连”的方式。

小国避免“被抛弃”的关键在于使自己对联盟更有价值，现有研究关注到小国有两种提升自我价值的策略。一是增加对联盟的贡献。小国既可以选择提升国防开支和强化军事能力，<sup>①</sup>也可以选择为联盟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战略资源，<sup>②</sup>以此为联盟做出更多贡献、提升其对联盟的价值，从而缓解自身“被抛弃”的风险。二是支持大国盟友的联盟外行动。由于直接触发联盟义务的情况很少出现，因此成员国更多时候需要通过联盟外行动来判断盟友的可靠性。反过来，支持盟友的联盟外行动成为小国展示自身可靠性和价值的重要途径。对此，贾斯汀·马西分析了加拿大参与美国主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原因，发现提升加拿大作为盟友的可靠性是其支持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的主要动因。<sup>③</sup>拉姆马斯·彼得森和雷克萨的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sup>④</sup>

而大国缓解“被牵连”风险的手段同样存在两种。一是对联盟机制进行主动设计。车维德认为，两极体系固有的“被牵连”风险，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特征，迫使美国在冷战时期通过构建双边联盟加强对亚太盟友外交和内政的控制，以避免卷入地区冲突。<sup>⑤</sup>迈克尔·贝克利也发现，美国在构

① Brian Blankenship,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Explaining Success and Failure of US Alliance Burden-sharing Pressure," *Security Studies*, Vol. 30, No. 5, 2021, pp. 691-724.

② Jens Ringsmose, "NATO Burden-sharing Redux: Continuity and Change After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1, No. 2, 2010, pp. 319-338; Scott Cooper and Kendall W. Stiles, "Who Commits the Most to NATO? It Depends on How We Measure Commitmen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6, 2021, pp. 1194-1206.

③ Justin Massie, "Why Canada Goes to War: Explaining Combat Participation in US-led Coalit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3, 2019, pp. 575-594.

④ Rasmus Brun Pedersen and Yf Reykers, "Show Them the Flag: Status Ambitions and Recognition in Small State Coalition Warfare," *European Security*, Vol. 29, No. 1, 2020, pp. 16-32.

⑤ Victor D. Cha, *Powerplay: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建联盟体系时通过协议漏洞、回避高昂的承诺、维持多元化的联盟组合等手段避免了“被牵连”的风险。<sup>①</sup>金东菲则区分了“纠缠”(entanglement)和“被牵连”两个概念。他指出,联盟成员为了防止“被牵连”,同时又不因制止“纠缠”而降低联盟的价值,会在联盟成立前和成立后对联盟协议进行细致的设计,以确保联盟可靠性。<sup>②</sup>

二是将联盟承诺作为议价筹码,以约束小国盟友的行动。方松英等人的研究发现,联盟成员国能够以拒绝履行联盟承诺作为威胁,对盟友的行为进行约束,以此避免“被牵连”的风险。<sup>③</sup>左希迎也提出,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盟友战略需求激增而自身无力兑现联盟承诺的难题。他认为美国执行了一种双重再保证战略作为应对,一方面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维持联盟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为盟友的外交政策划定红线,避免被拖入地区纷争中。<sup>④</sup>考虑到联盟的机制设计大多在联盟形成时期已经完成,因此,约束盟友实际上是缓解“被牵连”风险更常用的手段。<sup>⑤</sup>

概言之,国际关系学界在小国或大国如何应对单一联盟困境的问题上已经有成熟的研究。事实上,部分研究也讨论了联盟成员面临双重风险的情形,提出提升联盟制度化水平、<sup>⑥</sup>加强自主防御能力建设,<sup>⑦</sup>或在利用联盟约束盟友行为的同时与盟友进行安全分工<sup>⑧</sup>等手段,可有助于缓解双重风险的压力。但这些研究仅讨论了小国成员的应对方式,忽视了作为联盟主导国的大国也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形,而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

① Michael Beckley, "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 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 S. 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9, No. 4, 2015, pp. 7-48.

② Tongfi Kim, "Why Alliances Entangle but Seldom Entrap States,"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3, 2011, pp. 350-377.

③ Songying Fang, Jesse C. Johnson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o Concede or to Resist?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Military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8, No. 4, 2014, pp. 775-809.

④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4—28页;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59—81页。

⑤ Miranda Priebe et al., *Do 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Ent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n Conflict?* RAND Corporation, 2021.

⑥ Kirsten Rafferty, "An Institutionalist Reinterpretation of Cold War Alliance Systems: Insights for Alliance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2, 2003, pp. 341-362.

⑦ Lionel P. Fatton, "A New Spear in Asia: Why Is Japan Moving Toward Autonomous Defen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9, No. 2, 2019, pp. 297-325.

⑧ Galia Press-Barnathan, "Managing the Hegemon: NATO Under Unipolarity," *Security Studies*, Vol. 15, No. 2, 2006, pp. 271-309.



## 二、联盟体系困境与联盟联结

关于联盟困境的既有研究大都关注单个联盟，但由于联盟相互依赖（alliance interdependence）的存在，<sup>①</sup> 联盟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同样可能面临困境。有学者基于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动态发展提出了“新联盟困境”的概念，包括联盟对手与联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联盟间困境，<sup>②</sup>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联盟困境研究在联盟体系层次上的空缺，但这一概念没有考虑联盟体系主导国同时面临多个对手的情景。本文以当前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动态演变为背景，提出“联盟体系困境”的概念，讨论了联盟体系在实现整体强化与维持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困境。面对联盟体系困境，除了成员国个体采取措施缓解自己所面临的风险外，主导国还不得不对联盟体系整体进行调整和转型。

### （一）大国竞争与联盟体系困境的形成

联盟体系是由同一个国家主导的不同联盟的总和，除主导国外，不同分支联盟的成员之间不存在安全义务。联盟体系困境描述的是主导国难以在强化联盟体系各个分支的同时维持联盟体系可靠性的情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是联盟体系主导国同时与不止一个对手展开竞争，或与一个对手在多个领域展开竞争。

与主导国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往往综合实力较强，并且在地区层次具有重要影响力。考虑到联盟体系成员国与主导国对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偏好通常保持一致，主导国的竞争对手也会被其盟友视为安全威胁，<sup>③</sup> 特别是在双方地理位置临近的情况下。当主导国同时面临多个竞争对手时，其不同分支联盟的盟友会将本地区的对手视为安全威胁，而由于不同分支联盟之间不存在安全义务，由此导致主导国及其盟友都可能同时面临双重风险。一方

<sup>①</sup> 联盟相互依赖指的是在由一个国家主导的联盟体系中一个分支联盟中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分支联盟，参见 Iain D. 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pp. 45-83; Iain D. Henr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in Asia, 1949-1969*,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2。

<sup>②</sup> 张景全、刘丽莉：《成本与困境：同盟理论的新探索》，《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2期，第11—22页。

<sup>③</sup> 刘丰：《联盟与国际秩序》，《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3—19页。

面，盟友在应对本地区的威胁时会担心被主导国抛弃，与此同时又会担心被主导国牵连进与其他地区对手的潜在冲突中。另一方面，主导国需要借助盟友的战略资源获得相比对手的竞争优势，因此同样会担心被盟友抛弃。而在不同盟友都面临直接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主导国也会担心因盟友的挑衅行为而被牵连。尽管主导国与盟友的威胁国互为竞争对手，但在同时与多个对手竞争时，与其中任何一方爆发冲突都会将主导国置于不利的战略态势。而当主导国与一个对手在多个领域展开竞争时，正如“新联盟困境”中的同一性困境所呈现的，成员国既担心主导国提供的安全保障能力和意愿不足，又担心因被主导国牵连而导致自身经济利益受损。基于同样的道理，主导国既担心成员国因顾及经济利益而疏远联盟，又担心被其挑衅行为而牵连。<sup>①</sup>

因而，在主导国与成员国同时面临“被抛弃”和“被牵连”双重风险的情况下，联盟体系将面临实现整体强化与维持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困境。传统的联盟体系强化策略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同时强化所有分支，这种策略尽管有助于缓解所有联盟成员的“被抛弃”风险，但主导国被其盟友牵连以及不同分支联盟成员经由主导国而相互牵连的风险，都将由此上升。不仅如此，主导国承担的安全成本也将大幅上升。另一种是对不同分支进行有选择的强化，这种策略尽管能缓解部分成员的“被抛弃”风险，但被强化分支的成员可能会将这种选择性强化视为主导国履行联盟义务的积极信号，由此更可能挑衅对手，从而提升主导国“被牵连”的风险。此外，未强化分支的成员将面临更严重的“被抛弃”风险，其经由主导国而“被牵连”的风险也将有所提升。总之，在主导国同时与多个对手展开竞争，或一个对手在多个领域展开竞争时，主导国与成员国都将面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双重风险，此时，传统形式的联盟强化策略难以在满足主导国与成员国战略需求的同时，维持联盟体系的可靠性，这由此构成了联盟体系困境。

需要注意的是，体系环境会为联盟体系困境提供生成土壤。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不对称联盟中主导国对于“被牵连”和中小成员国对于“被抛弃”的担忧。但事实上，在单极和两极体系中，由于联盟的功能更加多元，主导国和成员国都可能受到两种风险的影响。对主导国来说，在单极体系中，即使不面临明确的威胁，也会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未来挑战等不同类型风险的影响，制衡风险的需求使联盟对主导国仍然具有重要的战

---

<sup>①</sup> 张景全、刘丽莉：《成本与困境：同盟理论的新探索》，第 16—17 页。



略意义。<sup>①</sup>此外，单极体系中的大国战略行为，特别是对外军事行动，<sup>②</sup>以及大国对国际利益格局的调整，<sup>③</sup>都需要以合法性为支撑，而联盟能为主导国提供合法性基础。在两极体系中，大国除了比拼物质实力外，还会就势力范围展开争夺，而联盟是大国巩固和拓展势力范围的重要工具。由于联盟体系主导国在安全和政治上对成员国存在持续的需求，因此主导国同样会担心被盟友抛弃。而对成员国来说，在单极体系中，单极结构决定了其他国家或国际制度难以对霸权国家的行动构成有效约束，而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强制手段相比外交手段更能高效实现政策目标。基于此，霸权国家更可能主动挑起冲突，<sup>④</sup>从而提升其盟友对于“被牵连”的担忧。而在两极体系中，正如格伦·斯奈德所言，有限的共同利益以及较弱的约束能力使小国更可能“被牵连”。<sup>⑤</sup>

总之，单极和两极体系下的联盟困境形式，并没有沃尔特和沃尔兹所分析得那么简单，由于主导国和成员国都对联盟有持续的安全和战略需求，因此双方都具备维持和发展联盟的强烈动力。正因如此，双方对于“被抛弃”和“被牵连”的担忧将持续存在。

## （二）联盟体系困境的应对选择

在联盟体系主导国同时与多个大国开展竞争或与一个大国在多个领域开展竞争的情况下，主导国与成员国将同时面临“被抛弃”和“被牵连”的双重风险，主导国所需承担的安全成本以及管理联盟的难度也将随之上升。与此同时，成员国加强战略自主的动力也会上升。例如，加利亚·普雷斯·巴纳森就考察了单极体系下北约欧洲成员国如何管理与美国的关系。他指出，欧洲国家的威胁认知随着时间和议题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处于一种同时担心被美国抛弃和被美国牵连的状态。为此，欧洲国家一方面利用联盟机制约束美国，另一方面则通过发展自主军事力量与美国进行分工，<sup>⑥</sup>而成员国战略自主性的上升将进一步强化主导国对于“被抛弃”和联盟效用下降的

① 魏冰、刘丰：《威胁认知、安全供给与北约扩张的逻辑》，《外交评论》，2022年第5期，第19—52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ter 3, Chapter 7.

③ 刘丰：《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外交评论》，2015年第5期，第46—62页。

④ Nuno P. Monteiro, "Unrest Assured: 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2012, pp. 9-40.

⑤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 484.

⑥ Galia Press-Barnathan, "Managing the Hegemon: NATO Under Unipolarity," pp. 271-309.

担忧。

为克服双重风险的挑战，主导国需要采取一种既能以低成本的方式兑现联盟承诺、又能强化联盟管理的手段。联盟成员国个体层次的措施只能缓解单个成员面临的双重风险，而传统的联盟强化手段又难以确保联盟体系的可靠性，这就意味着联盟体系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进行调整和转型。本文提出，联盟联结构成了主导国破解联盟体系困境的有效手段。联盟联结是指联盟体系的不同分支联盟之间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形式加强合作。当分支联盟均为双边联盟时，联盟联结易于识别。当涉及多边联盟时，则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多边联盟作为一个整体与联盟体系的其他分支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另一种则是多边联盟的部分成员在主导国的协调下与其他分支联盟建立新的安全合作关系。<sup>①</sup>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盟友对美国的价值并不等同。如迈克尔·马斯坦杜诺所认为的，美国霸权秩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联盟体系中关键伙伴（lynchpin partnerships）的依赖，这些国家有能力破坏霸权秩序，但更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并且为霸权秩序的管理和维护提供有益的帮助，<sup>②</sup> 因此，这些国家对美国更为重要。考虑到不同盟友的战略价值不同，主导国在选择联盟联结对象时也会根据战略需要及成本和收益考虑进行权衡。相比传统形式的联盟强化策略，联盟联结能为主导国带来三方面的收益。

第一，提升竞争优势。对大国而言，不对称联盟的主要功能并非提供安全保障，而是获得相对竞争对手的优势。黄宇兴的研究表明，不对称联盟形成的必要条件是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功能分异，其中，大国使用武力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小国则向大国提供人口、领土、物资等战略资源以增强大国的权力优势。<sup>③</sup> 联盟联结则能够进一步放大主导国的优势。在传统的联盟体系结构下，不同分支联盟对主导国的支持通常是相互独立的，主导国往往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才能争取到不同盟友的支持。例如，美国每次组建军事联合

---

① 魏冰、刘丰：《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扩张的逻辑》，《拉丁美洲研究》，2024 年第 5 期，第 36—39 页。

② Michael Mastanduno, “Partner Politics: Russia,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Extending US Hegemony After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Vol. 28, No. 3, 2019, pp. 479-504.

③ 黄宇兴：《功能分异与联盟形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 年第 2 期，第 101—122 页。

阵线时都需要对一些盟友进行物质收买才能说服其参与行动。<sup>①</sup>而联盟联结在加强不同地区盟友合作的同时,可以将不同盟友的战略资源以相对制度化的形式进行汇总,使主导国能够以成本更低的方式动员所有盟友的安全资源和力量,<sup>②</sup>并借助不同地区盟友的力量共同对竞争对手进行施压和围堵,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对对手的竞争优势。

第二,降低安全成本。按照詹姆斯·莫罗的理解,不对称联盟内部存在安全利益与自主利益的交易过程。大国以向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和接受“被牵连”风险的形式让渡安全利益,以换取小国对其提升自主利益的支持。而小国则以向大国提供战略资源和外交支持等形式让渡自主利益,来换取大国的安全保障。<sup>③</sup>由此可见,大国成员承担了联盟主要的安全成本。而联盟联结能够通过两种方式降低主导国的安全成本。一是建立针对单个竞争对手的统一阵线,以缓解主导国的战略压力。按照传统的联盟强化方式,主导国需要分别加强不同地区联盟的力量以与本地区对手开展竞争,但这种方式实际上仍然由主导国承担主要的安全成本。而通过联盟联结,主导国可以将不同分支联盟的成员集合到同一条阵线中,鼓励成员国在特定议题上向某个对手施加战略和政治压力,从而有效缓解主导国的压力。二是促进不同盟友之间互相提供支持,以降低主导国的成本。联盟体系的不同分支之间不存在安全义务,所有成员在安全上都主要依靠主导国。而一旦实现联盟联结,这就意味着不同分支联盟的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安全对话与合作的渠道。与一般的国际机制功能类似,<sup>④</sup>这些渠道能够发展成为各方共享战略资源、协调共同行动、实现军事分工的合作平台。此外,实力更弱的成员还能借此寻求实力更强成员的援助,由此也可以分摊主导国的安全成本。

第三,强化联盟约束。联盟在帮助成员国威慑对手的同时,也可能纵容

<sup>①</sup> Marina E. Henke,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How the United States Builds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1, No. 2, 2017, pp. 410-424; Marina E. Henke, *Constructing Allied Cooperation: Diplomacy, Payments, and Power in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Marina E. Henke, "Buying Allies: Payment Practices in Multilateral Military Coalition-Build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3, No. 4, 2019, pp. 128-162.

<sup>②</sup> 凌胜利、王彦飞:《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91—126页。

<sup>③</sup>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sup>④</sup>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6.

成员国的挑衅行为。<sup>①</sup> 格伦·斯奈德指出，在联盟政治中，与盟友的博弈和与对手的博弈是同步进行的，坚定支持盟友的行为固然能够缓解盟友对“被抛弃”的担忧，但也会鼓励其主动挑衅对手。<sup>②</sup> 特别是当主导国与成员国都与同一国家处于敌对立场时，成员国对于主导国履行联盟义务的信心越强，其采取进攻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由此，这也将提升主导国的“被牵连”风险。在面临联盟体系困境时，由于不同分支联盟都存在这样的风险，因此主导国管理和约束盟友的难度较高。除此之外，成员国对于战略自主的追求也提升了联盟管理的难度。而联盟联结能够以两种方式强化主导国对盟友的约束能力。一是为主导国影响成员国的对外行为提供额外的渠道。借助联盟联结所建立的合作机制，主导国可以在联盟之外进一步以自己的偏好塑造成员国的行为预期，并联合其他盟友对更可能主动挑起冲突的盟友施压，以约束其挑衅行为。二是通过加强联盟捆绑而强化主导国对成员国的控制。新的安全合作机制本就要求主导国投入更多资源，主导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将随之扩大，双方的绑定程度也会提高，主导国也能够以此为杠杆强化对成员国的控制和影响。

实际上，除了主导国外，成员国也能够从联盟联结中获益。一方面，与主导国加强捆绑能够强化安全预期。由于主导国的战略资源有限，而其盟友数量众多，主导国需要分散资源用于保护不同地区的盟友。当某个地区面临紧迫威胁时，主导国不得不向其倾斜资源投入，由此将降低其他地区盟友的安全预期。而联盟联结能够进一步强化成员国与主导国的绑定，从而提升主导国履行对该成员国联盟义务的意愿。另一方面，联盟联结也有助于规避被主导国牵连的风险。一些联盟成员对主导国的竞争对手威胁认知相对较弱，或与主导国的竞争对手存在紧密经济联系，他们会担心被主导国牵连进不必要的冲突中。在不对称联盟中，小国对大国的政策影响力较小，而主导国对联盟联结的需求赋予了成员国一定程度上影响主导国行为的能力。同时，联盟联结还为成员国提供了与主导国其他盟友建立议价联合的平台，当双方都不希望被主导国牵连时，可以在这些合作机制中共同向主导国施压，以约束其行为。此外，联盟联结所形成的合作机制相比联盟更加灵活，成员国可以选择一些低烈度的方式避免被主导国牵连。

---

① 漆海霞：《威慑抑或纵容：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与冲突》，《当代亚太》，2018 年第 5 期，第 4—31 页。

②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pp. 468-471.

概言之，联盟联结能够在满足双重风险下主导国与成员国的安全与战略需求的同时，一定程度上降低双方“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从而维持联盟体系的可靠性，因此，它是克服联盟体系困境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而言，主导国在联盟联结的过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因为主导国是联系不同分支联盟成员的关键枢纽，但成员国的立场和态度也会影响联盟联结的形成过程及其效果，所以，我们以下将重点讨论联盟主导国为何以及如何确立联盟联结问题。

### 三、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及其盟友的双重风险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不断扩张，以服务于其霸权护持目标。然而，由于美国霸权在后冷战时代的不同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挑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也随之进行过多次调整，因此，美国联盟体系的功能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在不同时期也存在明显差异。

在后冷战时代的前二十年，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于应对欧洲地区不稳定、全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为此，美国联合盟友共同发起过多次海外军事行动。由于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军事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并且双方在作战协调上存在一定障碍，因此，美国实际上承担了绝大部分作战任务，这也导致美国在联盟成本分摊问题上与盟友产生了激烈争吵。此外，美国与其盟友，特别是欧洲盟友的对外政策偏好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在超强实力的支撑下，美国表现出了对单边主义和军事手段的强烈偏好，而欧洲国家则更倾向于采取基于国际法的政治手段。<sup>①</sup> 美国联盟体系在这一时期面临诸多困境，但在主导国缺乏明确竞争对手的背景下，联盟困境主要集中在成员国层次，而未延伸至联盟体系层次。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大国竞争逐渐回归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规划。<sup>②</sup> 一方面，2014 年 3 月爆发的克里米亚危机正式确立了美国与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关系，2022 年的俄乌冲突则将这种对抗关系推向了顶峰。另一方面，自 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负

<sup>①</sup> 罗伯特·卡根：《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刘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 页。

<sup>②</sup> 左希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三章、第四章。

面认知就越来越强，并于 2011 年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挑起了对华战略竞争。这一时期，美国与其盟友仍然在责任分摊和政策协调等问题上进行过争吵，双方在维持国际秩序的偏好上也出现了一定分歧。<sup>①</sup>然而，在美国同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对中国发起“全政府”“全领域”竞争的情况下，美国与其盟友对彼此的战略需求无疑都上升了。盟友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强化自身安全、美国则需要调用盟友的战略资源打压中国和俄罗斯。正是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与其盟友不得不共同应对双重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联盟体系困境。

### （一）美国盟友的双重风险

身处亚洲和欧洲地区的美国盟国虽然都面临双重风险，但是各国具体的担忧却存在差异。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和韩国对于双重风险的担忧最为明显。菲律宾面临的双重风险集中在中国身上。一方面，菲律宾担心在南海问题上被美国抛弃，即使是反美情绪强烈的杜特尔特总统，也曾表示，“我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滚出菲律宾，毕竟，我们需要他们在南中国海。我们没有军备。”<sup>②</sup>另一方面，由于在经济领域高度依赖中国，菲律宾担心被美国牵连进与中国的正面冲突中，甚至在中菲存在争端的海洋领域，菲律宾都明确表示不愿卷入中美海上冲突。<sup>③</sup>当前的马科斯政府也仍然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sup>④</sup>澳大利亚同样如此。在 2016 年以前，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主要表现为对冲，即在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合作的同时，保持对中国的安全防范。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直言，其对华政策的动力是“恐惧与贪婪”。<sup>⑤</sup>尽管在 2016 年下半年至 2022 年上半年期间，在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澳大利亚的对华战略出现了由对冲转向制衡的趋势，<sup>⑥</sup>

①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第 33—36 页。

② 《总统：菲在南海问题上需美国保护》，《菲律宾商报》，2016 年 9 月 21 日，<http://www.shangbao.com.ph/fgyw/2016/09-21/55294.shtml>。

③ Jim Gomez, “Philippines Says It Won’t Be Embroiled in US-China Sea Spat,” *The Seattle Times*, January 21, 2018, <https://www.seattletimes.com/nation-world/philippines-says-it-wont-be-embroiled-in-us-china-sea-spat/>。

④ 曹筱阳：《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6 期，第 99—103 页。

⑤ David S. G. Goodman, “Australia and the China Threat: Managing Ambigu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0, No. 5, 2017, p. 772.

⑥ 查雯：《大国竞争升级下对冲战略的瓦解与延续——以澳大利亚、菲律宾、新加坡的对华政策为例》，《外交评论》，2021 年第 4 期，第 32—38 页。



但自 2022 年 5 月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再度回归到对冲立场。澳大利亚在外交和经贸领域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但在安全领域仍然对中国保持警惕。<sup>①</sup> 在 2023 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阿尔巴尼斯在发表主旨演讲时就明确表示，不应该将亚太地区描述为冲突舞台，并支持在中美之间建立可靠且开放的沟通渠道。<sup>②</sup> 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既希望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又不希望卷入中美的潜在冲突中。韩国的双重风险则分散于半岛地区和中国。由于朝核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解决，韩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力量来维护自身安全，因此长期处于“被抛弃”的恐惧中。而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激化也使韩国越来越担心在中美两国的潜在冲突中“被牵连”。由于与中国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并且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处理半岛问题，韩国也不希望与中国直接为敌。<sup>③</sup> 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韩国于 2017 年顺利完成了“萨德”导弹系统的部署，但文在寅政府在 2019 年向中国许下的“三不”承诺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韩国不希望过度刺激中国的意图。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尽管推行“美韩联盟优先”政策，但双方深度的互补性经济合作仍然是韩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sup>④</sup>

另外，美国的其他亚洲盟友也有自己的担忧。例如，日本更担心被美国抛弃。日本始终将中国视为对手，在自身实力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高度依靠美国的安全保障，因此面临“被抛弃”的风险，尤其是对美国在东亚安全局势紧张的时期履行联盟义务缺乏信心。<sup>⑤</sup> 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担忧。两线作战的局面将迫使美国减少在亚洲地区投入的战略资源，加之美国国家实力逐渐衰弱，日本对于被美国抛弃的担忧随之增

① 孙志强、张蕴岭：《地位焦虑视角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嬗变》，《东南亚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126—128 页。

② Anthony Albanese, “Keynote Address on 20th IISS Shangri-La Dialogue,” June 2, 2023, [https://www.iiss.org/globalassets/media-library--content--migration/files/shangri-la-dialogue/2023/final-transcripts/keynote-address/anthony-albanese-prime-minister-australia--as-delivered\\_sld23.pdf](https://www.iiss.org/globalassets/media-library--content--migration/files/shangri-la-dialogue/2023/final-transcripts/keynote-address/anthony-albanese-prime-minister-australia--as-delivered_sld23.pdf).

③ Matteo Dia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Rise of a Network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 185-207.

④ 申锺浩：《韩国尹锡悦政府的对华政策展望》，《现代国际关系》，2022 年第 5 期，第 54—58 页。

⑤ 吴怀中：《“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日本学刊》，2022 年第 5 期，第 36—37 页。

强。<sup>①</sup>然而，美俄敌对的激化也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于“被牵连”的担忧，担心日本被迫卷入美国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中。<sup>②</sup>而泰国则没有将中国视为安全威胁。<sup>③</sup>长期以来，泰国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尤其是在美泰双方因泰国国内政治问题而产生矛盾的时期，中泰双方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中明确表示，泰国“必须致力于维持与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关系平衡”，并“采取有效举措保持外交平衡战略”。<sup>④</sup>因此，与日本相反，泰国反而更担心被美国牵连。

而在欧洲地区，美国的北约盟友也有不同的理由担心在欧洲被盟主抛弃和被牵连进亚洲的冲突。自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这场危机进一步刺激了中东欧成员国对联盟的安全需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再度要求美国和北约在其领土范围内常驻部队。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尽管仍然希望在接触与合作的政策框架下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sup>⑤</sup>但也意识到不得不强化对俄罗斯的防御姿态。<sup>⑥</sup>在此背景下，北约制定了《准备行动计划》，一方面通过加强军事存在和军事活动提升安全保证和威慑能力，另一方面则寻求改变联盟的长期军事态势和能力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sup>⑦</sup>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除了中东欧国家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抗俄意愿和要求北约加强集体防御能

---

① 卢昊、赵家敏：《乌克兰危机下的日美同盟形势与战略影响》，《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5 期，第 21—22 页；吴怀中、从伊宁：《岸田内阁的日本与北约军事安全合作评析》，《东北亚学刊》，2023 年第 4 期，第 60—61 页。

② Naoko Funatsu et al.,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the Age of Crisis,”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March 29, 2023, <https://globalaffairs.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US-Japan%20Report%20PDF.pdf>.

③ 刘琳：《“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国与东南亚军事关系解析》，《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 年第 6 期，第 105 页。

④ 周方治：《中美战略竞争下泰国的“非中性”对冲：特征、成因与趋势》，《南洋问题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68—69 页。

⑤ 张健：《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北约转型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5 期，第 11—12 页；邢骅：《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北约改革》，《国际问题研究》，2015 年第 3 期，第 72—73 页。

⑥ Melanie Amann et al., “Berlin Considers Its Alliance Options,” *Spiegel*, March 31, 2014,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nato-looking-for-appropriate-response-to-putin-a-961692.html>.

⑦ NATO, “NATO’s Readiness Action Plan,” December 2014,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4\\_12/20141202\\_141202-facstsheet-rap-en.pdf](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pdf_2014_12/20141202_141202-facstsheet-rap-en.pdf).

力外，德国和法国也基本放弃了此前通过安抚俄罗斯来谋求妥协的做法，转而寻求对俄罗斯的军事制衡。<sup>①</sup>然而，仅靠欧洲国家自己的力量显然难以应对俄罗斯的挑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瑞尔在2022年3月的欧洲议会辩论中就明确表示，“很明显，我们的威慑能力不足以阻止俄罗斯的攻击”。<sup>②</sup>有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国家需要在常规军事能力方面额外投入10到15年时间，才能弥补美国对欧洲的防务贡献。<sup>③</sup>这也表明欧洲国家对北约和美国的安全依赖仍在不断增强，对于“被抛弃”的担忧也随之上升。

进一步来看，尽管欧洲国家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安全威胁，但作为北约主导国的美国却认为中国的挑战更为严峻，这也导致欧洲国家面临“被牵连”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在2019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诬称，“中国对北约构成了巨大的风险，正试图渗透北约的体制和北约的通信和技术”，“北约需要准备好对中国采取这样的措施。”<sup>④</sup>北约在随后的伦敦首脑峰会上首次将中国崛起纳入议程，并在2022年版战略概念文件中将中国列为与俄罗斯同等重要的竞争对手。<sup>⑤</sup>然而，欧洲国家对此却存在明显的顾虑。北约一位外交官早在2019年伦敦峰会前就指出，“一些成员为取悦特朗普而把中国列为北约的下一个敌人，但大多数欧洲国家知道，这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sup>⑥</sup>除了少数国家由于对美国强烈的安全需求和国内政治等原因而不得不配合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外，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多数欧洲国家并不支持利用北约来打压中国。<sup>⑦</sup>在2021年6月召开的北约布鲁塞尔峰会上，

① 冯玉军：《俄乌冲突的地区及全球影响》，《外交评论》，2022年第6期，第84页；李超：《俄乌冲突下的德国安全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6期，第12—13页；“Macron Boosts French Military Spending by over a Third to ‘Transform’ Army,” *Reuters*, January 21, 2023,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erospace-defense/frances-macron-proposes-big-hike-military-spending-2024-2030-2023-01-20/>。

② Josep Borrell, “The Future of Europe Is Being Defined Now,”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March 3, 2022,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future-europe-being-defined-now-0\\_en](https://www.eeas.europa.eu/eeas/future-europe-being-defined-now-0_en)。

③ 田德林：《解析欧盟“战略自主”困局》，《欧洲研究》，2021年第5期，第38页。

④ U. S. Embassy in Argentina, “Secretary Pompeo Remarks on ‘Diplomatic Realism, Restraint, and Respect in Latin America’,” December 2, 2019, <https://ar.usembassy.gov/secretary-pompeo-remarks-on-diplomatic-realism-restraint-and-respect-in-latin-america/>。

⑤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⑥ Phil Stewart and Robin Emmott, “Long Focused on Russia, NATO Widens Gaze Towards China,” *Reuters*, December 4,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nato-summit-usa-china-idUKKBN1Y81J5>。

⑦ 朱锋、王笑天：《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欧洲角色》，《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第107—112页。

法国总统马克龙便明确指出,“北约是一个关注北大西洋地区的组织,中国与北大西洋地区的关系不大。”<sup>①</sup> 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后更是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收购德国汉堡港码头股权,并在国内反对声音较强的情况下于 2022 年 11 月出访中国,成为近三年来首个访问中国的欧洲国家领导人。<sup>②</sup> 在中国存在紧密经济联系且俄罗斯威胁日渐严峻的背景下,欧洲多数国家希望集中北约的力量应对俄罗斯,而非分散到中国问题上,这种心态事实上反映了它们对于“被牵连”的担忧。

## (二) 美国的双重风险

对美国而言,尽管不需要借助盟友的军事力量保障国家安全,但维护国际主导地位仍然离不开盟友的支持,尤其是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时期,美国对盟友存在更强烈的需求,<sup>③</sup>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体系层次,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以盟友的支持为重要合法性基础,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地位也正是以盟友在政治、经济、安全和价值观上的追随为前提。<sup>④</sup> 此外,联盟成员国形成的“获胜集合”能够帮助美国确立在特定体系内的政治经济利益优势,以确保美国的领先地位。第二,在地区层次,联盟为美国维持在各个地区的安全存在和对地区事务的介入提供了支点,美国能够借此压制竞争对手,以确保自身优势。不仅如此,联盟还能强化美国的关系性权力,以加强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力制衡。<sup>⑤</sup> 在中国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而美国综合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美国更加需要盟友提供可预期的支持。

具体到不同地区,欧洲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都极力确保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对美国而言,欧洲是其维护霸权地位和遏制俄罗斯的重要前沿。<sup>⑥</sup> 随着俄罗斯带来的挑战日渐严峻,美国对欧洲国家的战略依赖也越来越强。除了主观需求外,欧盟

---

① David M. Herszenhorn and Rym Momtaz, “NATO Leaders See Rising Threats from China, But Not Eye to Eye with Each Other,” *Politico*, June 14, 2021,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nato-leaders-see-rising-threats-from-china-but-not-eye-to-eye-with-each-other/>.

② Alain Tao, “Olaf Scholz’s China Gamble,” *The Diplomat*, December 21,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12/olaf-scholz-china-gamble/>.

③ 刘丰:《秩序主导、内部纷争与美国联盟体系转型》,第 27—29 页;周方银:《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19 年第 2 期,第 6 页。

④ G. John Ikenberry, “The End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No. 1, 2018, pp. 14-17.

⑤ 董枋壮:《影响力制衡:主导国应对崛起国的关系性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 年第 8 期,第 106—133 页。

⑥ 田德文:《解析欧盟“战略自主”困局》,第 38 页。

战略自主的加强也在客观上加剧了美国的担忧。自 2016 年以来, 欧盟加速了对战略自主的追求。2016 年 6 月发布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全球战略》报告提出, “适度的战略追求和战略自主对于欧洲促进境内外和平与安全的能力至关重要。”<sup>①</sup> 这也使得美国更加担心欧洲国家会脱离其主导的联盟体系。

而在亚洲地区, 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速, 美国一方面对盟友的战略需求迅速上升。正如 2022 年 2 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所言, “在迅速变化的战略格局中, 我们认识到, 只有与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一起, 坚定地将美国锚定在印太地区, 并加强该地区本身, 美国的利益才能得到推进。”<sup>②</sup> 另一方面, 美国也担心其盟友会由于与中国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而向中国靠拢, 或选择在中美之间相对中立。<sup>③</sup> 因此, 美国对亚洲盟友同样存在“被抛弃”的顾虑。尤其考虑到大国实力的衰退本身就会使其他国家怀疑其战略可信性,<sup>④</sup> 在综合实力相对衰退的背景下, 美国更担心盟友脱离自身阵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积极调整亚太联盟政策以淡化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的冲击, 寻求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sup>⑤</sup>

与此同时, 在两大地区同时开展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美国面临的“被牵连”风险也在上升。美国明确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 这种姿态在其盟友看来是一种履行联盟义务的积极信号, 由此可能对其盟友产生纵容效应, 鼓励后者对竞争对手采取挑衅行为。<sup>⑥</sup> 除此之外, 美国的竞争战略也可能被其盟友利用, 从而进一步加剧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安全困境, 导致在相关议题中被拖入与中俄对抗乃至爆发冲突的境地。<sup>⑦</sup> 尽管美国积极推动与中

① European Union, *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A Global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June 2016, [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https://www.eeas.europa.eu/sites/default/files/eugs_review_web_0.pdf).

②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③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4—24页。

④ Daryl Press, “The Credibility of Power: Assessing Threats During the ‘Appeasement’ Crises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2004, pp. 136-169.

⑤ 凌胜利、李航:《拜登政府的亚太联盟政策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4期,第19—27页。

⑥ 漆海霞:《威慑抑或纵容: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与冲突》,第4—31页。

⑦ 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14页。

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但美国并不希望与两个核大国爆发直接冲突，尤其考虑到美国当前的国防和工业能力已难以应对一场全球性战争。<sup>①</sup>

#### 四、联盟体系困境与美国亚欧联盟体系的联结

在面临双重风险的情况下，美国及其盟友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进行应对。美国盟友主要寻求提升战略自主，如韩国加速建设独立的常规威慑能力，<sup>②</sup>欧洲国家选择加强自主防务。<sup>③</sup>美国则通过实施有学者提出的“双重再保证”战略以期在亚太地区同时达到安抚盟友和约束盟友的效果。<sup>④</sup>然而，这些措施仅有助于改善成员国个体所面临的风险，对联盟体系困境难以起到缓解作用。在此背景下，美国积极推动其亚欧联盟体系之间进行联盟联结。

##### （一）美国联盟体系联结的表现

美国联盟体系内的联盟联结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推动亚洲联盟体系内部分支之间的联结。美国的亚洲联盟体系包括美国分别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组建的五组双边联盟。早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美国就曾联合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主要地区盟友建立了多个三边安全合作机制，以协调在朝核问题、恐怖主义等安全议题上的政策。自 2010 年以来，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不断加速，美国加强了打压中国的力度，以寻求巩固地区霸权地位。除了协助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并提升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双边军事协调能力外，美国的另一个地区战略重点便是扩展联盟体系，试图将传统的“轴辐”联盟体系打造为“网络式”地区安全架构，以期对中国进行全方向的围堵。<sup>⑤</sup>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印度等国两两之间签署了广泛的安全合作协议。如日本与印度分别

---

① Seth G. Jones, “The U. S. Defense Industrial Base Is Not Prepared for a Possible Conflict with China,”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features.csis.org/preparing-the-US-industrial-base-to-deter-conflict-with-China/>.

② Ian Bowers and Henrik Stålhane Hiim, “Conventional Counterforce Dilemmas: South Korea’s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5, No. 3, 2020, pp. 7-39.

③ François Heisbourg, “NATO 4.0: The Atlantic Alliance and the Rise of China,” *Survival*, Vol. 62, No. 2, 2020, p. 93.

④ 左希迎：《亚太联盟转型与美国的双重再保证战略》，第 59—81 页。

⑤ Matteo Dian and Hugo Meijer, “Networking Hegemony: Alliance Dynamics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7, No. 2, 2020, pp. 131-149.



在 2015 年和 2020 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 和《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另外,日本与韩国在 2016 年也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与澳大利亚在 2017 年签署了《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与菲律宾在 2024 年 7 月签署《互惠准入协定》(RAA)。此外,美国的这些盟友和伙伴还通过美国主导的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强化了作战协调能力和彼此间的军事互助。<sup>①</sup> 其中,重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则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机制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四国共同组成的协调救灾集团。在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推动下,四国在 2007 年 5 月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举行了首次安全对话,一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随着 2007 年 9 月安倍晋三下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也逐渐被搁置。直到 2017 年 11 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日本的努力下得以重启并升级,讨论的议题也由传统的防务合作延伸至基建供应链等经济合作。<sup>②</sup> 在价值观因素的加持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也较为明确。但也有学者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在印太地区防御上的战略价值远不及三边安全合作机制。<sup>③</sup>

第二,加强亚欧两大地区联盟体系之间的联结。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美国亚洲联盟体系核心的日本就开始与北约进行接触,并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主导的一系列危机管理行动提供物资支持。21 世纪初,为了配合全球反恐战略,美国一方面强化了与亚洲盟友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则主导推进了北约的“全球化”进程,提出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伙伴关系,而美国的亚洲盟友和安全伙伴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姿态变化,美国的亚洲联盟体系和欧洲联盟体系之间再度加强了联盟联结。在 2020 年 12 月的北约外长会议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受邀参会,各方共同讨论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结构带来的影响。在 2021 年 6 月的布鲁塞尔峰会上,北约还提出要加强与亚太伙伴的合作。2022 年 5 月,韩国正式加入“北约合

① Nina Silove, “The Pivot Before the Pivot: U. S. Strategy to Preserve the Power Balance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4, 2016, pp. 74-79.

② 曹鹏鹏、石斌:《“印太视域”下“四国机制”的同盟化及其限度》,《太平洋学报》,2021 年第 10 期,第 41—54 页;林民旺:《“印太”的建构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外交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16—35 页。

③ Hayley Channer, “Trilateral-Not Quad-Is the Best Chance for Indo-Pacific Defense,” *The Diplomat*, June 16, 2022,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6/trilateral-not-quad-is-the-best-chance-for-indo-pacific-defense/>.

作网络空间防御卓越中心”，成为该组织首个亚洲成员，日本也于同年 11 月加入。此外，北约还通过议程设置和协同行动两种路径推动其网络空间在亚太地区的扩张，进而提升其影响亚太安全局势的能力。<sup>①</sup> 在 2022 年 6 月的马德里峰会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这也释放了更明确的联盟联结信号。北约 2022 年版战略概念文件也指出，“印度—太平洋地区对北约很重要，因为该地区的事态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我们将加强与印太地区新老伙伴的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跨地区的挑战，维护共同安全利益。”<sup>②</sup>

此外，在俄乌冲突的过程中，美国亚洲盟友也积极配合了美国和北约的行动。日本实施了多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笔经济援助。不仅如此，日本还专门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执行方针，以便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战略物质。<sup>③</sup> 韩国在冲突爆发之初便与北约展开对话，对俄罗斯的行动进行谴责，并向乌克兰提供近 2 亿美元的经济援助。<sup>④</sup> 澳大利亚则更为积极，除了经济援助外，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直接军事援助。<sup>⑤</sup>

除了在现有的联盟框架下进行合作外，美国还拉拢重要的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单独建立安全合作机制。最为典型的就是 2021 年 9 月建立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由美国和英国共同支持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这一机制被美国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称为当下“最重要的战略创新”。<sup>⑥</sup> 此后，不少美国的亚洲盟友和伙伴表示希望加入该机制，而日本率先宣布加入第二支柱合作。美国还有意将英、法、德、意等主要欧洲盟友纳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框架下的军演活动，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联合巡航。<sup>⑦</sup>

---

① 苗争鸣：《网络赋权北约亚太扩张演进路径及其影响》，《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1 期，第 79—91 页。

② NATO,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③ 吴怀中、从伊宁：《岸田内阁的日本与北约军事安全合作评析》，第 59 页。

④ 李航、樊慧凝、凌胜利：《韩国与北约的互动关系：进程、动因与影响》，《当代韩国》，2023 年第 3 期，第 21 页。

⑤ 《澳大利亚将向德国部署预警机，以“确保援乌通道安全”》，观察者网，2023 年 7 月 11 日，[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23\\_07\\_11\\_700484.shtml](https://www.guancha.cn/military-affairs/2023_07_11_700484.shtml)。

⑥ Sarah Basford Canales, “AUKUS ‘Most Important Strategic Innovation’ as China Looks to ‘Break’ Australia: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dvisor Kurt Campbell,” *The Canberra Times*, December 1, 2021, <https://www.canberratimes.com.au/story/7533455/aukus-not-doomed-to-fail-as-china-wants-to-break-australia-biden-advisor/>.

⑦ 陈艺元：《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的动因和举措》，《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 年第 6 期，第 30—31 页。

在美国的支持下，日本和英国也加强了防务安全合作并深化战略伙伴关系，通过签署一系列安全合作协议建立起了事实上的“准联盟”关系。<sup>①</sup>

## （二）美国亚欧联盟体系联结的动力

对于美国来说，推动亚欧联盟联结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提升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实力优势。美国联盟体系过去的合作模式是，美国以各个分支联盟为支点加强与盟友的安全合作，而不同分支联盟之间不存在较强的合作关系。这种模式能够保持美国对其盟友最大程度的控制，但从战略资源利用的角度来看只能起到“1+1=2”的效果。而通过联盟联结，美国能够同时将不同盟友的优势资源进行整合，提升应对热点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及塑造地区安全态势的能力，并在特定的安全议题中协调盟友的立场，通过开展联合行动向竞争对手施加更强的战略压力，从而起到“1+1>2”的效果。<sup>②</sup> 尤其是在面临双重风险的背景下，美国的主要亚欧盟友都加强了战略自主，由此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而联盟联结能够推动不同盟友由各自为战走向联合作战，有助于缓和彼此间的嫌隙并提升战略互信，从而提升整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sup>③</sup> 有学者提出，对美国而言，将美日联盟和美韩联盟进行更高层次的融合能够在政治和战略领域确立更大的优势，美国可以考虑建立美、日、韩三边的“网络联盟”（network alliance）框架。<sup>④</sup> 这种观点反映了联盟联结对于提升联盟凝聚力和竞争优势的积极作用。

举例而言，在印太地区，美国不断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为平台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美国此举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间的情报共享，通过强化战略协调提升了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水平，并煽动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发起挑战，以期笼络更多国家为其对华竞争战略提供实际支持。<sup>⑤</sup> 而“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建立则为美国打压中国提供了重要渠道，通过支持澳大利亚发展核潜艇，以及深化三方在人工智

① 赵迎结、吕耀东：《“印太”视阈下日英“准同盟”关系的构建与局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8期，第43—55页。

② 周方银：《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与中国的应对》，第13页；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当代世界》，2012年第10期，第12页。

③ 左希迎：《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第21页。

④ Scott Snyder, “Korea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An American Perspectiv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119-136.

⑤ 张根海：《“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133—155页。

能、高超音速和量子计算等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美国既强化了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对中国的威慑力量，又通过研发先进技术和武器确保对中国的军事优势。在日本宣布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第二支柱项目合作的情况下，中国乃至整个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形势都将进一步恶化。<sup>①</sup> 美国还在台湾问题上联合欧洲和亚洲主要盟友共同介入和干预，妄图阻碍中国的统一进程。<sup>②</sup> 而在欧洲地区，美国积极推动其亚洲盟友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以强化对俄罗斯的竞争优势。自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和北约高官在 2023 年初便相继出访韩国和日本，敦促两国继续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技术封锁和金融阻断，并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sup>③</sup> 美国尤其鼓励日本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期望以日本与俄罗斯的矛盾为抓手，对俄罗斯进行牵制，以分散俄罗斯的战略力量。<sup>④</sup>

不仅如此，由于中美战略竞争体现在经济、技术、安全等多个领域，而传统的联盟合作往往只关注安全领域，因此过去的联盟合作模式无法完全满足美国的竞争需求。联盟联结下的合作则能够延伸至“泛安全”领域。正式联盟通常以外部安全威胁为动力，与此不同，联盟联结所形成的合作机制更加依赖于内在的合作需求，成员国可以针对所关注的特定议题进行合作，不论是在合作内容还是合作程度上，都具有更高程度的灵活性。<sup>⑤</sup> 例如，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美国联合其欧亚盟友和安全伙伴在 5G、量子技术、半导体等多个领域建立“技术联盟”，寻求在科技领域取得对中国的竞争优势。<sup>⑥</sup> 美国还在 2022 年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联合其欧亚盟友和伙伴在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和反腐败四

---

① 孟晓旭：《“奥库斯”扩员威胁亚太安全》，《当代世界》，2024 年第 5 期，第 70—71 页。

② 叶晓迪：《拜登涉台政策的“同盟联动”现象：机制、举证与影响》，《闽台关系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22—33 页。

③ 许海云：《北约秘书长访问韩日意欲何为》，光明网，2023 年 2 月 9 日，<https://m.gmw.cn/baijia/2023-02/09/36356085.html>。

④ 朱海燕：《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27—128 页。

⑤ 从形式上看，联盟联结更像是一种“alignment”，关于“alignment”和“alliance”的区别，参见 Thomas S. Wilkins, “‘Alignment’, Not ‘Alliance’ —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Toward a Conceptual Taxonomy of Align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8, No. 1, 2012, pp. 53-76.

⑥ 唐新华：《西方“技术联盟”：构建新科技霸权的战略路径》，《现代国际关系》，2021 年第 1 期，第 38—46 页。

个方面加强合作，以与中国竞争地区经济主导权。<sup>①</sup>

其次是降低美国的安全成本，实现美国的“逆向搭便车”。<sup>②</sup>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盟友和伙伴之间加强互助，以削减其联盟责任。“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机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了维持在印太地区的军事优势，美国通过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架构来提升澳大利亚的核威慑能力，而英国的参与则分摊了美国的部分成本，降低了美国的财政压力。<sup>③</sup>日、韩、印、澳等美国主要印太地区盟友和伙伴也通过签署一系列双边安全合作协议加强了军事合作，部分替代了原来由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日本还帮助菲律宾等国提升海岸侦察、警戒和应对海上突发事件的能力。<sup>④</sup>日本还在2022年12月联合英国与意大利共同推出“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CAP）项目，商讨合作研发新一代隐形战机。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推动该项目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不愿与其分享这类技术，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联盟联结有助于缓解美国作为联盟体系主导国的安全成本。<sup>⑤</sup>

另一方面，美国还鼓励盟友和伙伴在特定议题上向对手共同施压，以缓解其战略压力。例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除了牵头发起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外，还煽动其主要欧洲和亚洲盟友共同进行干涉。如在2021年2月第四次“2+2”会谈上，英国和日本讨论了中国东海和南海局势，双方同意在英国向印太地区派遣航母期间展开联合训练。同年5月的德日“2+2”会谈以及2023年5月的法日“2+2”会谈还讨论了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试图在外交上对中国施压。<sup>⑥</sup>在经济领域，美国也不断要求其盟友与中国进行脱钩，尤其是推进产业链“去中国化”，通过加强与盟友和伙伴在通信科技、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来摆脱所谓的对中国供应链“依赖”，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② 张翔、王联合：《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国际展望》，2023年第2期，第37—56页。

③ 王剑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双重性质、战略考量与争议因素》，《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2年第5期，第37—54页。

④ 赵明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美日同盟转型》，第14页。

⑤ 《与英国意大利签署协议，日本拉北约两国造隐形战机》，环球网，2023年12月16日，<https://mil.huanqiu.com/article/4Fm2qYrgADo>。

⑥ 赵纪周、赵晨：《同盟体系中的“副盟主”角色析论——以21世纪的英国为例》，《欧洲研究》，2023年第6期，第104页。



并构建更加“多元化”的供应链体系,<sup>①</sup>从而缓解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战略压力。

最后是强化联盟约束。一方面,美国可以利用联盟联结产生的新的合作机制向盟友施压。当澳大利亚在 2016 年前与中国保持紧密的外交和经济接触时,美国就计划利用“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加强对澳大利亚的约束。基于学者的总结,“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的价值就在于“留住美国、让日本做更多、拴住澳大利亚”。<sup>②</sup>美国积极建设美日菲三边合作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相比于美菲关系更容易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冲击,如杜特尔特政府对美菲关系构成的挑战,日菲关系则长期保持稳定,日本在与菲律宾合作的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更小,因此,日本的加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协助美国约束菲律宾。<sup>③</sup>另一方面,联盟联结的过程也强化了盟友对美国的依赖。美国以小多边机制为平台加强了与盟友和伙伴之间的联合军演、情报共享、作战规划和协同行动等活动,在强化军事互操作性和集体威慑能力的同时,也使盟友和伙伴对美国的军事依赖不断上升。<sup>④</sup>例如,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架构中,澳大利亚使用美国的核潜艇技术将使其丧失自主发展机遇,难以基于本国利益做出理性决策,从而不得不接受美国的约束和管理。<sup>⑤</sup>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主要盟友出于加强联盟捆绑和规避“被牵连”风险的目的也为联盟联结提供了支持。日本在推动亚洲联盟网络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望借此增加与中国打交道的筹码,<sup>⑥</sup>并弥补美国在亚太地区政治领导力的不足,<sup>⑦</sup>从而强化其对美国的价值和捆绑。日本还加强了与

---

① 李冬新:《美国“去中国化”产业链重塑战略对中日韩合作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24 年第 6 期,第 78—92 页。

② Tomohiko Satake, “Shaping the Future: The US-Japan-Australia Strategic Triangle,”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September 7-8, 2017,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arbeitspapiere/BCAS2017\\_Paper\\_Tomohiko\\_Satake.pdf](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arbeitspapiere/BCAS2017_Paper_Tomohiko_Satake.pdf).

③ Gregory B. Poling, Andreyka Natalegawa and Danielle Fallin, “Building a U. S. -Japan-Philippines Triad,”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1, 2023,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uilding-us-japan-philippines-triad>.

④ 包广将、饶金山:《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东南亚研究》,2023 年第 3 期,第 121 页。

⑤ 王帆:《美国亚太联盟多边化的可能性——基于协同性和威胁源的分析》,《当代美国评论》,2023 年第 1 期,第 5 页。

⑥ 孙茹:《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44 页。

⑦ Matteo Dia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Rise of a Networked Security Architecture in East Asia,” p. 198.



北约的联系，将与北约的合作视为一种确保美国安全承诺的手段。<sup>①</sup> 澳大利亚积极参与美日澳等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主要目的，也是寻求将美国的战略承诺通过制度化的形式与地区安全事务进行捆绑。<sup>②</sup> 部分欧洲国家支持美国推动北约“亚太化”的目的同样是将此作为与美国进行深度绑定的交易筹码。<sup>③</sup> 此外，北约“亚太化”过程中的合作具有更高层次的灵活性，北约成员可以按照自己偏好的节奏和程度开展合作，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卷入中美潜在冲突的风险。<sup>④</sup> 例如，德国在配合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时，有意避开了涉及中国的争议海域，并向中国提出了停靠上海港的要求，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实际上，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最好的办法是由美国的亚洲盟友应对中国、自己集中力量应对俄罗斯。<sup>⑤</sup> 但考虑到欧洲国家仍然需要美国的力量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因此不得不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

## 结 语

在国家安全战略目标转向大国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同时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竞争对手。在强化联盟体系各个分支的同时，美国也在推动不同联盟分支之间进行联结。尽管联盟联结会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在面临联盟体系困境的情况下，联盟联结所带来的收益仍然吸引美国及其盟友的积极支持。其中，亚欧联盟联结是美国联盟体系近年来的新动向，为了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力度，美国寻求将北约的力量牵引到亚太地区。实际上，关于如何在北约框架下应对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国内存在两种方案。一种方案认为，美国应该将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制衡中国、而将制衡俄罗斯的任务交给欧洲国家。另一种方案则认为，美国应当在军事领域制衡中国和

① Hitoshi Suzuki,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ew Chances for the Japan-U.S. Alliance?” in Takashi Inoguchi, G. John Ikenberry and Yoichiro Sato, eds., *The U.S.-Japan Security Alliance: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pp. 253-270; 卢昊、赵家敏：《乌克兰危机下的日美同盟形势与战略影响》，第26—27页；吴怀中、从伊宁：《岸田内阁的日本与北约军事安全合作评析》，第61页。

② Tomohiko Satake, “Shaping the Future: The US-Japan-Australia Strategic Triangle”.

③ 薛振威、孙云：《俄乌冲突背景下“北约印太化”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5期，第92—93页。

④ 包广将、饶金山：《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第120页。

⑤ Rafal Ulatowski, “German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Strengthening the Liberal Order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2, 2022, pp. 383-402.

俄罗斯、而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协助美国制衡中国。<sup>①</sup>然而，前一种方案显然会进一步助长欧洲国家的战略自主，后一种方案则可能因欧洲国家与中国存在的紧密经济联系而难以起到应有的效果。相比之下，美国认为，联盟联结是美国在维持联盟凝聚力与可靠性的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有效方式。通过拉拢特定盟友建立新的合作渠道，联盟联结既能在多个领域强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同时也能避免联盟内部的政策分歧。只不过，欧洲国家的差异性诉求以及俄罗斯的现实挑战会对北约转向亚太的前景构成极大的限制，亚欧联盟联结并非一帆风顺。

整体而言，在亚欧联盟联结的加持下，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效用正不断增强，在助力美国巩固全球霸权地位的同时，也对中国和俄罗斯构成了重大安全挑战。然而，随着盟友间合作的深化，美国主要盟友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正逐渐下降，在联盟中的议价能力将由此上升，美国未来在联盟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将可能被削弱。这种变化也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创造了战略机遇，可以利用美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矛盾或利益分歧对美国全球联盟体系实施一定程度的反制。从这个角度来说，亚欧联盟联结尽管强化了美国全球联盟体系，但也对美国构成了潜在挑战，使其在维系和管理联盟体系的过程中不得不更加重视与盟友的协调与妥协。

（责任编辑：吴文成）

---

<sup>①</sup> Darrell Driver et al., "Return to Realism? NATO and Global Competition," *Defence Studies*, Vol. 22, No. 3, 2022, pp. 497-501.

combination of the two factors generates Turkey's diverse policies toward NATO.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high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follower policy;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high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in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policy of compromise;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low and the elite consensus is in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confrontational policy; when the systemic pressure is low and elite consensus is consistent, Turkey tends to adopt a speculative policy. The deployment of Jupiter missiles, the response to the Cyprus crisis, the handling of the Kurdish issue and the deployment of "S-400" missiles constitute typical cases that verify Turkey's follower, compromising, confrontational or speculative policy towards NATO. Therefo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rastic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Turkey's domestic politics, Turkey's policies towards NATO will continue to vary on different issues.

**Key words:** Turkey, NATO, foreign policy, systemic pressure, elite consensus, alliance management

##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lliance System Dilemma and the Connection of America's Alliance Systems in Asia and Europe**

*WEI B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imultaneously designating China and Russia as strategic competitors, the U. S.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of its Asian and European alliances. However, the connection of the U. S. alliances in Asia and Europe will heighten the common external threat perception of China and Russia, thus providing impetus for enhanced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creasing strategic pressure on the U. S.. It is in this strategic context that the U. S. insistence on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of its Asian and European alliances is worth exploring in depth. In fact, the primary motivation of the U. S. endeavor is the alliance system dilemma caused b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 e., balancing overall alliance strengthening endeavors with needs to maintain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ompeting with both China and Russia, the U. S. and its allies face the dual risk of "abandonment" and "entrapment". The U. S. needs the power and resources of its allies to compete but does not want to be drawn into conflicts provoked by these allies; similarly, U. S. allies seek its security guarantees but do not wish to be involved in direct conflict between great power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conventional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alliances are insufficient to maintain their reliability. However, Connecting alliances can achieve both alliance strengthening and reliability by enhanc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reducing security costs, and reinforcing alliance's constraining power, all while meeting US strategic needs at a relatively low cost. Despite the above benefits, connecting its alliances in Asia and Europe will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key U. S. allies and thus enhance their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lliance, which may ultimately undermine the U. 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alliance system.

**Key words:** alliance dilemma, alliance connection, the U. S. alliance strategy, Asia-Pacific NATO, Asia-Pacific version of NATO

## **The “Drift” and Reshaping of the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LEI Jianfeng*

**Abstract:** Since the mid-2000s, the Russia-led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has been increasingly “adrift”,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o Russia’s regional authority on the rise and the regional order increasingly unstable. The EU and NATO have in fact become important external forces impacting on the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changing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in the region and raising the cost of 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The internal causes of the “drift” in the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are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other Eurasian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supply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ord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integration. Such differences have become more salient with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Russia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external forces. With the ongoing Russia-Ukraine conflict, Eurasian countries can deepen their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strengthen cooperation withi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BRICS, and actively seek the “largest common denominator”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This will help change the “drift” and reshape a more open and inclusive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Key words:** Russian diplomacy, NATO’s eastward expansion, Eurasian regional order, CSTO,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译审:王振玲)